

社會學

多元、正義、民主與科技風險

策劃／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主編／李炳南



社會學

多元、正義、民主與科技風險

張茂桂、顧忠華、洪謙德、張錦華、張苙雲、
黃瑞祺、石計生、方念萱、周桂田 等著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社會學：多元、正義、民主與科技風險 / 張茂桂等著。- 臺北市：臺大國發所，2007[民 96]面；公分

ISBN 978-986-00-9678-1 (平裝)

1. 社會學 - 論文, 講詞等

540.7

96008693

社會學

多元、正義、民主與科技風險

作者 / 張茂桂、顧忠華、洪鎌德、張錦華、張苙雲、黃瑞祺、石計生、方念萱、周桂田

發行人 / 李炳南

出版者 /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總經銷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100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21 號 5 樓之 11

電話：(02) 2382-1120 傳真：(02) 2331-4416

E-mail: hanlu@hanlu.com.tw

網址：http://www.hanlu.com.tw

出版日期 / 2007 年 6 月

定價 / 200 元

(如有缺頁或倒裝，本公司負責換新)

序

多元主義、正義、民主與科技風險為當代社會相當具挑戰性的課題，尤其面對激烈的全球化過程，各個在地社會與國家面對程度不同的民族國家認同、公民社會建構、多元文化衝突、社會運動與正義轉型、民主轉型與深化、科技上的工具主義、數位落差、科技風險與決策治理等問題，顯示了社會需要新的思維與實踐典範來因應不斷變動的世界。也就是說，這些看似各屬領域的問題雖然表徵了變動社會中不同面向的個別問題，但在結構面上卻是相互的緊密關聯。例如，族群和解與多元主義、公民社會與科技風險、醫療正義與專家壟斷政治、數位落差與科技民主、民主深化與細微社會權利的科技、知識控制等。因此，本書透過系列演講的出版，企圖提供與建構新而前瞻性的社會實踐理論典範思維，從結構面上探索知識轉化社會變遷的可能。

在這個脈絡下，我們規劃這一系列的演講並編輯成書，邀請張茂桂教授闡析台灣族群政治的出路、認同上的歷史脈絡衝突與未來和解的可能方向，並思考這個關係台灣未來巨大的社會工程如何進行與發展，而關係到未來世代的前進方向。從建構社會資本的角度，顧忠華教授提出了公民社會網絡與繁複而

龐雜社會事務中之實踐關係的重要性，特別是當代公民面對不同社會事務所具有自我營運、發展與動員的能耐，將是該社會公民力量展現的重要資本。洪謙德教授從福科論細微權利的角度，討論後現代政治論述與社會實踐的關係，尤其論述的衝突、控制與權力將扮演在現代複雜分化社會中重要的角色。張錦華教授從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切入，具體的批判分析當代台灣重要的政治敘述所帶來歷史性的意義建構、意義再生產問題，而主張多元脈絡與文化相對尊重的邏輯方是符映現代國家與社會的發展。從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實踐的經驗，張苙雲教授指出對抗現代社會高度複雜而官僚的專業單位，最重要的利器就在於以法人（團體）對抗法人（團體），而面對高度利益糾結、複雜專業的醫界，社會運動改革的契機就在於逐步建構明白而清晰的大眾知識，透過一次次的運動推動來發展新的醫療社會典範。

黃瑞祺教授從自由主義民主出發，探討當代全球化挑戰下對當代社會民主的重構問題，包括公民社會的能耐與再民主化，或透過審議民主來企圖為複雜爭議的社會倫理問題提出解決出路，而與本書其他專題相互呼應。石計生教授則介紹其運用地理資訊系統在社會學上的研究，除了輔助量化調查工具外，同時能夠更清晰的展現資料的地理分佈空間分析與掌握。同時，石教授也從批評的觀點提出這套社會科學統計運用系統潛藏的風險與問題。從數位落差的角度，方念萱教授相當細膩

的提出其透過經驗研究中所發現現代人們運用數位科技的恐慌、記憶保存與認同的差異。尤其是分析女性面對數位網路科技所面臨的權力問題、挑戰與衍生出性別問題，以及再定位的社會關係議題。周桂田教授透過其經驗訪談分析，討論在現代科技風險不確定下專家間的爭議在這個社會沒有被凸顯的原因，並指出因為國家風險溝通制度與實踐的怠惰，造成社會發展出遲滯、隱匿的風險文化現象，而不利於我國建立科技發展的總體能耐。

總體而言，本書各篇精彩的專題討論將呼應現行社會所面對的各項重要問題，並提出新的視野與觀點，而為當下台灣社會研究留下精闢的註腳。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李炳南 謹誌

2006年10月26日

目 錄

張茂桂	台灣族群和解的坎坷路	1
顧忠華	公民社會：社會資本的建構	45
洪鎌德	福科後現代的政治論述	69
張錦華	傳播社會學：多元文化主義的研究觀點	113
張苙雲	醫療正義與社會運動—知識與公義的追求：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的實作經驗	131
黃瑞祺	民主的重構及深化：一個社會學的觀點	149
石計生	地理資訊系統社會學	163
方念萱	再思數位落差：有無之外的探討	179
周桂田	風險文化、專家爭議與科技決策—遲滯型高 科技風險社會之再思考	203

台灣族群和解的坎坷路

張茂桂 教授

學歷：美國普度大學社會學博士

現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清華大學社會所合聘教授

研究專長：政治與社會、社會運動、族群關係與民族主義

壹、前言

這篇文章想要檢視近二十年來在台灣曾經出現過的一些重要政治「和解」論述。過去關於台灣政治民主化、本土化運動、以及選舉行為的相關研究，常偏向分析政治制度面的演變，或者選民的心理認同分析，進而從「制衡」、「衝突」、「動員」、制度設計等等的政治過程出發，解釋我們的民主化與社會發展。然而在這過程中，社會大眾對於政治上的「族群動員」，則迭有怨言，甚至憤懣。在這個近二十年的政治轉型過程中，因為不斷的有反覆選舉動員、政黨相互杯葛與衝突，這對於「社會織成」(social fabrics)到底會造成什麼作用，我們所知確實不多。

所謂「社會織成」，是把社會比喻為一塊布料，布料必須有一些反覆纏繞成纖維線的很多線索，依據一定的形式、邏輯才能

織在一起。所謂「社會織成」所指涉的就是那些有關組成分子之間假定一定存在的信賴關係、功能關係、共享的行事邏輯、網絡、制度，以及和社會安全感、或者和群體歸屬感有關的那些不可以清楚計算或者量化，那些屬於「非實質」，難以直接覺察，可是卻對日常生活有影響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相對於既有研究與評論興趣，雖然有不少的評論，但是研究卻相對很少。

「衝突」可以說是民主化、本土化、政黨輪替、後威權轉型正義的幾乎的「必然後果」。歷年來，我們每進行一次選舉，其實也就是在進行一次政治權力的重分配。為達到這目的，不同立場的黨派，就必須進行社會動員，「衝突」難以避免。而「和解」是什麼呢？為什麼「和解」是必要的？這篇文章，只是這樣方向的初步嘗試，它的起始點在於政治「衝突」與政治「和解」的關係，希望透過對於「和解」的看重，突顯出關於「社會織成」這個重要的課題。因此，將從「衝突」轉向「和解」，從「政治」轉向「社會」的研究，也就是有關「社會織成」的問題。這裡要先整理過去有關「共同體」、「和解」的論述的整理，以及，如何評價，並解釋為何無法達到真正的和解的感覺的問題。這些包括了「四大族群」、「生命共同體與新台灣人主義」、「大和解、大聯合」、以及後續同樣以此為名的相關的言說與行動。

本文進行的方法是想要從不同政治黨派立場的言說材料中，討論他們如何構築自己的立場的背景分析，更進一步詮釋他們的言說時空中的相關政治行動與意義架構，進一步解釋為何人民對於族群問題的感受卻可能是日益嚴重，或者更益發不信任政治的問題。

貳、「我也是台灣人」——蔣經國晚年的民主化、本土化與和解

本文要處理的第一個和解論述與行動，是蔣經國晚年和台灣人反抗者的和解努力。晚近人們對於蔣經國的評價給予兩種對立觀點。一種認為他是不學無術的情報頭子、獨裁與壓迫者（如吳乃德，2004），即使他推動了 1985 年之後台灣的自由化與本土化，也是在內外壓力交逼下所做的選擇（如王振寰，1989）。另外一種觀點則是認為他在晚年真的做了不簡單的抉擇，即便他是獨裁者，但也唯因為有像他這樣擁有完全不被挑戰權力的獨裁者，才有可能帶領國民黨走出威權，朝向本土化，民主化的路線。（Tseng, 1999）

持後面這一觀點的人其實也包括接任蔣經國總統位置的李登輝在內。李登輝曾經在不同的場合中感謝蔣經國的拔擢與「教導」，而在《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允晨，2004）一書中，透過他和蔣的談話記錄與回憶，則更進一步紀錄了他在 1984 年 5 月至 1988 年 1 月期間（正是台灣重要的威權轉型與政治自由化的時期），他身為副總統與中常委，得以近距離和蔣經國談話與接觸得到的「正面」觀察。而其中好幾段和本文有直接關係。

李認為蔣經國「跳過」了孫運璿、謝東閔、林洋港等先進的資歷，提名自己為副總統一職，可能有特別的深意，雖然自己也

不很清楚（李登輝，2004：4、8）。而從 1984 年 5 月開始的在三年八個月期間，他觀察到蔣經國如何自我約束對於威權的濫用，特別是對民間與社會抗爭，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讓自由化得以逐漸進行，其中一個轉捩點，是 1986 年 9 月不對民進黨「非法組成」進行鎮壓，並隨後宣布解除戒嚴令等措施。（頁 188-191）

從《見證台灣》的描寫來看，李登輝是蔣經國晚年健康不佳，不良於行，身處宮廷，他身邊多為外省權貴重臣所環繞，時而必須面對「台灣本土老百姓」的一個重要「窗口」。當時蔣一方面借重李的農經專長，借重省主席、市長任內的地方網絡，另一方面也借重他和台灣長老教會的淵源，和廣義的「黨外人士」以及「新約教會」抗議團體等等進行溝通工作。

在 1987 年 6-7 月之間，民進黨正連續發動街頭抗議，反對擬議中取代「戒嚴法」的「國家安全法」，而且，在政治場域之外，還有台灣戒嚴時期因為「第十信用合作社」倒閉而引起的最廣泛的群眾抗議，手段激進的新約教會民眾抗議，以及各種環境「自力救濟」事件，台灣陷在一片抗議聲中。當時蔣經國突然指示規劃和「十二位民間耆老」會面的問題。（頁 230-31）在 6 月 26 日那天，李登輝受命邀請台灣民間「德高望重」之人，「為國謀事」。當時李登輝轉請總統府第一局去擬了推薦名單，茶會的時間則在 7 月 27 日舉行。更重要的是，在媒體廣泛報導的情形下，蔣經國對在場的耆老們說出「我在台灣住了四十年，我也可以算是台灣人」因而被廣泛引述的「名句」。

蔣經國於 1988 年 1 月去世。國民黨仍然繼續掌握政權達 12 年之久。但在李登輝執政時代，國民黨不論內部與外部，都發生了實質的改變。雖然說蔣經國在 1986 年看到「時代在變，潮流再變」，已願意公開承認民主化問題與本土化問題的不可全面壓抑，但是恐還不能容忍對於國家認同的挑戰問題。時至今日，經過七次修憲以及四次總統選舉（三次普選），民主化、本土化難以逆轉，台灣的政治制度與文化發展，雖然受到經濟西進與中國崛起的雙重打壓，但是仍維持一定發展的空間，原來的蔣經國時代的政治議題，現在已被一個更大的「參考架構」，涉及到選舉、中央政府制度改造、教育文化政策、國際關係等的「參考架構」所統攝，那就是和「國家認同」、「藍綠（政黨）競爭」有關的問題。

國家認同問題不但是關於國防、外交，等國家的國際活動，同時關於爭取人民的效忠問題，所以它能透過政治活動的符碼、動員以及國家資源分配的穿透力，進入文化、教育、藝術、體育、日常生活等各個層面，是以可同時具有團結或者分解、排除的社會力量。這種同時團結與分解的力量，這兩種力量的拉鋸，何時成爲團結，何時成爲分裂，將因爲政治人物、政黨、言說立場，而出現不同的解讀。

上述蔣經國對於「本土」和解的言說，和他之前提拔本省籍政治菁英進入統治高層的行動，對於李登輝以及和他黨內的同輩們而言，是一種積極的肯定行動。但是對於當年處在抗爭位置的「民進黨」來說，這些施作卻只是在抗爭壓力與維護政權的考量

下，所做的「讓步」，這使他們繼續成爲被打壓的一方。

整體回顧 1980 年代，國民黨仍然一黨獨大，但蔣經國晚年加速「本土化」和「自由化」的作爲，不同於世界上其他倒台的「掠奪」、「帝王」的獨裁者形象，維持了「轉化」的開端與可能，公平地說，這實在是一種「既壓抑、又吸納」的轉型期的和解策略，用李登輝的回憶來說：

「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原因是擋不住潮流……他說過「我也是台灣人」，不過這句話是他在一九八七年才開始說的，其實他還是中國人。……蔣經國對民主化有沒有一套完整的規劃？我不大清楚。他是在思考解除戒嚴、解除黨禁、組黨等等這些大方向，其中也有「吹台青」的問題，不過我看他絕對沒有維持本土政權的意思。他的改革是慢慢一步步做。他一定沒想到台灣人會在國民黨裡掌權，沒想到民進黨這麼快就拿到政權。」（頁 235、237）¹

參、台灣本土論述中的 「四大族群」與和解

蔣經國的「我也是台灣人」與「自由化」並進，代表威權執政者的重要的自我約束與「和解」。而另外一組和解論述，則直

¹ 事實上蔣經國對於解除「黨禁」這件事情的條件，是新的政黨一定「不能主張台灣獨立」。這是他在????號對華盛頓郵報訪問時所陳述的條件。

接和「國家認同」有關的，是在 1990 年代開始，立場上完全不一樣，在台灣出現的「四大族群」相關論述。這組相關論述有兩個揉合在一起的參照點。一是以台灣全體住民，而非中華民族，要建立一種國民身分的想像共同體；另外一個是以組成這個共同體的四個群體為參照。這兩個參照點揉合在一起的對立面，就是過去定於一尊的中華民族（國族）、炎黃子孫神話。因此「四大族群」也既是一種對抗，也是一種和解論述。一方面對抗過去的國族壓迫，另一方面則要和不同背景的族群，不分差異的攜手建立共同體。

我曾經不同的文章分別追溯了關於「多元文化」論述的「思辨與拉雜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過程(張茂桂, 1997、2002)。²基本上，「四大族群」是 1980 年後期在台灣出現，附著於台灣建立獨立國家論述之下的「演繹」論述。它背後的最深層的假定，是台灣人民內部有不同的血統與文化來源，自成一個民族，或者，將來「應該」自成一個不同於「中華民族」、有自己的國家的民族體。

「四大族群」的「前身」，曾經出現於不同版本的台灣獨立主張中。比如 1980 年初期，許世楷撰擬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其中第三條宣示「台灣共和國的國民，由於語言以及移住

² 所謂「思辨與拉雜形構」，是一種言說、論述取得意識型態支配位置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對於不同話語進行有意的操弄，如對各種場域、領域的相關或不相關的論述的有目的的假借、引用、比喻、反駁、意義的搭架，或者斷章取義的過程。

時期等的不同，可以分為馬來波里尼西亞語系、福佬語系、客家語系、北京語系，四文化集團。文化集團的所屬，由國民依法自由選擇、決定之；其決定，每五年得依法修改一次。任何文化集團，不得歧視或壓制其他文化集團。」

其中「馬來波里尼西亞」指的是現在的「原住民族」，而「北京語系」則是指大陸人或者外省人（「新住民」）。

又比如，1994年6月由「臺灣教授協會」推動的『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第二次臺灣人民制憲會議）中，在第9章第100條，明白宣告：「臺灣現有住民包含原住民、新住民（即外省人）、客家、Holo四大族群，統稱為臺灣人。」同時在第104條中規定，各族群依法推派等額國會議員，組成「族群委員會」，討論有關族群之法律案件，這算是台灣的反對運動的「建國」運動者，對於這個論述再度做了一個定性式的陳述。

1980年後期，民進黨繼續黨外的「台灣人出頭天」政治運動。為讓這個運動繼續茁壯，必須為將來推翻國民黨之後，為新國家社會的整合提出藍圖。因此，在政治反對陣營中，展開了一場「立憲運動」作為將來凝聚不同的建國勢力與意識主張。「四大族群」也是在討論「台灣國」的人民主張，這樣的情境脈絡下進行。

現代國家承認多元化，進而區辨不同的族群文化背景，但是仍不能特別排除特定族群。要讓「非」台灣人背景、「沒有出頭天感受」的其他人群，也能接受或者信賴新的國家的理想，就必須團結更多的人，正當化自己的立場與政治光譜。而原來的「省

籍二分類」不能夠面對 1988 年以後、新興的社會政治現象，如原住民運動、客家運動、環境運動、勞工運動、婦女運動的興起。所以建立一個較有包容性、進步性的「臺灣人」的想像，成為必要，而「四大族群」也配合誕生。

「四大族群」以及相關論述，有幾個特性：(1)它曾是當代反抗「外來」威權統治論述之一部分，它不止於反對中華民族的大一統觀念，也強調台灣人的歷史存在是不可被抹煞的事實。(2)它同時是一種新發明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試圖取代過去的省籍二分，把稍早的原住民族運動、客家人說母語運動³結合在一起，避免「台灣人即福佬人的中心主義」的疑慮問題。因此，它意圖展現的是 1980 年代的「新」的台灣人論述，取代大中國主義的意識型態的「整合」地位，為台灣尋求新的社會聯帶與想像的「契約」關係，而這種想像的「契約」關係，將符合台灣獨立國的人民組成。

³ 「客家人運動」以八八年的「母語運動」為轉捩點。這個運動其實是客家的「族群尊嚴」與自我認同運動；它要求整個社會，特別是國家政策承認客家語與文化的獨特性加以尊重，並且試圖提昇客家人的自我意識，取得在社會的充分發言權，而不是做疏離的少數。在此之前「客家」並不是一個被正視的公共議題，而在這個運動之後，透過客家社群的不斷自我動員與改造，使得政治與其他的社會部門，陸續開始正視客家問題的合法性。「客家運動」有兩個對立主軸，一個是針對國家的不公平的國語語言政策，一個是針對傳統以「福佬」為領導主流的政治反對運動，他們對於客家的少數身份的疏忽，或者對於「福佬」要求「客家」向臺灣中心意識看齊的「同化」要求。因此和客家人有關的身份認同、社會文化位置問題，也不能簡單地歸納入和「省籍」有關的二分類法。

「四大族群」雖然有兩種價值參照，但抗爭的性格卻超過和解，這不是因為論述本身的問題，而是因為政治壓迫與衝突的問題，也就是說台灣獨立運動的長期的「非法性」以及被鎮壓問題。如，當時外省背景的黨外作家鄭南榕，他長期參與黨外運動，後來在擔任主編的《自由時代》刊出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他基於愛台灣以及絕對的言論自由，在對抗警總的強力取締行動時，自焚身亡，事件一時間震撼了當時的反對運動，也間接刺激了公開主張台獨的異議聲浪。

當時正是大批過去被列為黑名單的台獨人士陸續潛回台灣，走入群眾，挑戰刑法 100 條「叛亂罪死刑、或無期徒刑」的罪刑問題。至於鄭南榕的遺孀，有客家人身分背景的葉菊蘭女士自 1989 年後擔任立法委員，成為「台獨」以及「四大族群」在立法院的最有力的發言者。她曾經數度用台灣人是否是中國人、國民黨是否是外來統治者，外省統治集團以及台灣人四大族群相關論述，利用政治揭發弊案的緣由，和當時的外省菁英如俞國華、郝柏村，以及趙少康、郁慕明領導的新國民黨連線，發生激烈的政治爭辯，將「台灣人、中國人」議題吵得火熱，但這也使得「四大族群」成為主張「台灣人」走出受害歷史的象徵符碼，因為「一中」的鎮壓，而成為「一台」的反抗，衝突對立的態勢使得「四大族群」的和解不能進行，不但不可能建立新的社會聯帶，反而成為衝突的新指標。

1995 年中華民國立法院進行第一次的全面改選，1996 年總統改為直選產生，國民黨在黨主席李登輝的領導下，兩次獲得勝